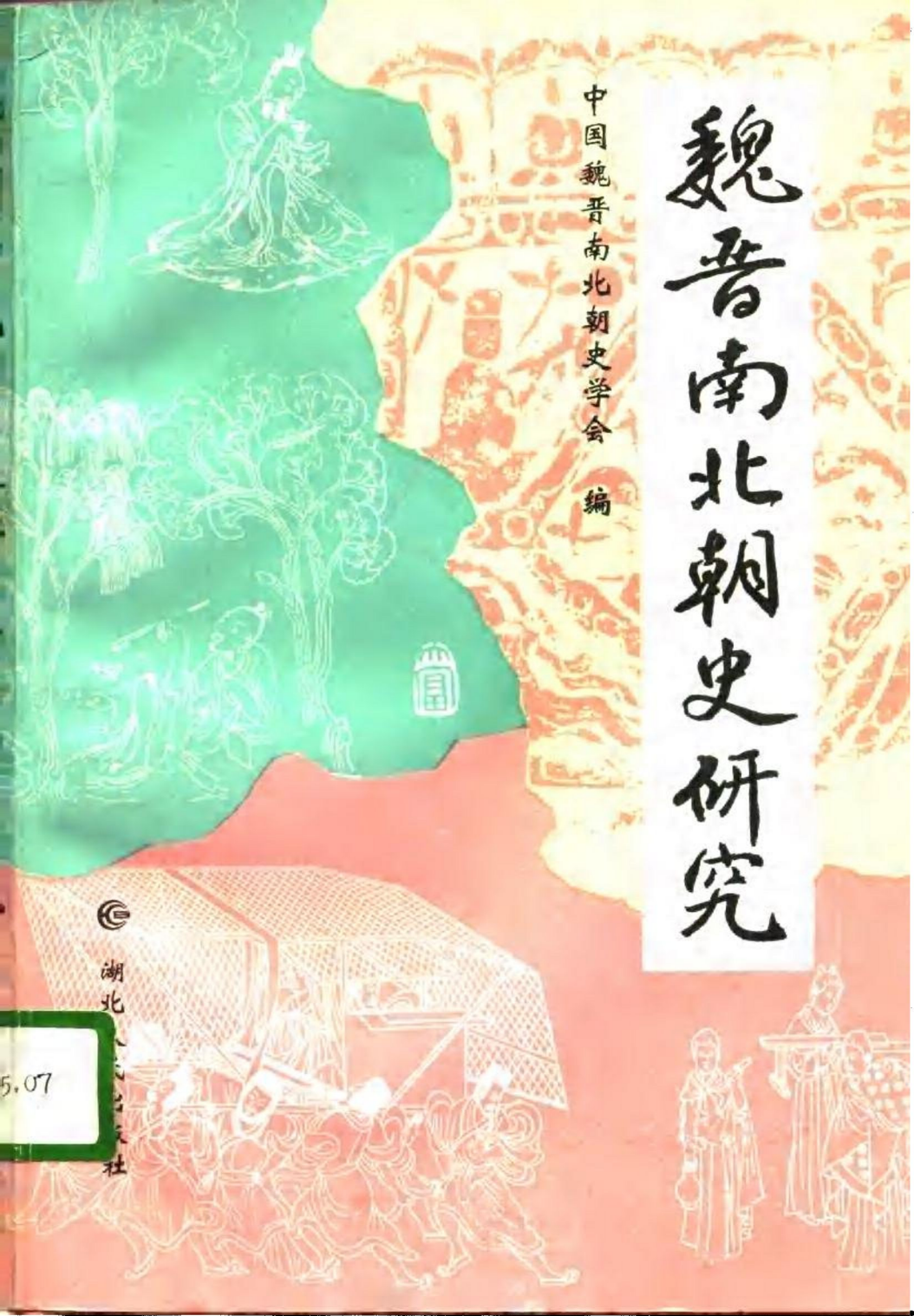


魏 晋 南 北 朝 史 研 究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编



湖北
正
社

5.07

魏晉南北朝史研究

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

編



遼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32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1

印张：10.625

字数：282 千字

印刷：襄樊日报印刷厂

印数：1—1000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16—01967—9 / K·193

定价：16.00 元

BA28116

97
K235.07

5
2

前 言

汉江水碧，岷岭山青。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承蒙当地党政领导的鼎力支持，于1995年9月1日至4日在历史文化名城湖北省襄樊市隆重召开。上百名中国学者与25名日本、韩国学者莅临。群贤并至，少长咸集，大会演讲，小会交流，这是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程中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会。

回顾本世纪以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学人的成长和学术的进程，都同当时的政治风云密切相关。第一阶段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我国长时期的封建统治结束了，接着1919年“五四运动”，提出民主和科学，从而使我国的学术研究迈向了新的历程。这个阶段的史学家，以陈寅恪、汤用彤、吕思勉三位先生为代表。他们国学根柢深厚，治学精勤，上承中国乾嘉学派学术之精髓，兼摄当时西方社会科学之丰富营养，在魏晋南北朝史的专题、专史和断代史研究方面做出了举世公认的出色贡献。他们的论著，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作为在这一学术领域进行现代意义科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先驱，他们将永远受到我们的敬重，其研究成果已经或正在被后来才俊所继承和发展。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专力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者尚寥寥可数。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这片学术领域中出现了一批后起名家，其中有的直接出自诸先生的门下，有的间接受其学术思想启迪而学成。

在第二阶段，以唐长孺、业师缪彦威及周一良、何兹全、王仲荦、韩国磐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著名学者，先后崛起于学界。

— 1 —

C

394681

他们或论考双精，或文史兼善，或学贯中西，或变通今古。就渊源而论，他们大都得益于前辈名家的润泽沾溉，是前辈名家的传薪者。但是，他们又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在其学术生命风华正茂之时，1949年新中国如沧海旭日喷薄而出，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哲学方法，并灵活运用于学术研究之中，从而使魏晋南北朝史这一学术园地展示出崭新的风貌。在社会经济形态、土地所有制形式、阶级及阶层结构、门阀士族制度、民族与民族融合、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等新拓宽的研究领域，他们作出的成绩尤其突出。就总体情况而论，此一阶段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超越了前人。可以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发展成为科学体系，在这一阶段已基本上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的学者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成长起来。虽然在他们刚开始步入历史科学殿堂之际，曾经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十年动乱达到极点。但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以往学术领域的种种禁区被冲破，加之学术思想封闭状态的改变，他们在思想意识上获得前所未有的大解放，蓄积已久的学术能量如火山一样爆发而出，终于迎来了自己治史生涯的黄金季节。自80年代起，又有一大批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新生力量登上史坛。他们思想解放，眼光敏锐，志向坚定，意气风发。这两支力量紧密团结，相互支持，构成了当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堂堂阵容。他们一方面继承并发扬前两阶段学者的优良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又积极吸收当今海外中国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研究成果的精华，努力以新课题、新角度、新思维、新材料、新方法来进行研究，从而使魏晋南北朝史的学术园地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这一阶段的学者，就实力而言，已经形成年龄结构合理而人数相当可观的完整学术梯队；就成果而论，已出版较有质量的专著数十部，发表有分量的论文数百篇，其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农民战争、民族、社会、中外关系、学术思想、文学、艺术、语言、宗教、教

育、科学技术、历史地理、人物传记、史籍整理、史学史、文献目录、考古文物等等，可谓珠玉满堂洋洋大观。

但是，我们绝不能成绩面前陶醉和自满，因为在本世纪即将结束而 21 世纪的钟声不久就要敲响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问题已经摆到我们的面前：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应当以什么样的面貌来迎接新的时代？或者说，如何创作出更多的史学精品，以适应改革开放卓见成效的伟大时代的要求？这是目前史学研究发展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作出正确的回答并予以实践，从而将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此次襄樊的学术盛会，即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程第三阶段的关键时刻召开。这是一次检阅队伍，从而鼓舞士气挑战未来的大会。作为队伍检阅的客观记录，便是这一部从上百篇大会论文中选择编定的论文集。

集中收入论文 26 篇。中国、日本、韩国的作者中，有蜚声学界的蔼然长者，也有著述丰硕的中年骨干，更有崭露头角的后进英髦。在政治史方面，选题跨度及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所论新意迭出。在经济史、民族史方面，一些作者特别注意运用近十年考古发现的新材料来进行论证，其论断不仅令人信服，而且有耳目一新的感受。涉及思想史、文化史的论题，一般都有相当的难度，但是文集中所收的这方面文章质量颇佳。更为可喜的是，它们大多出自富于春秋的年轻学者笔下，这不仅反映出他们对于当前史学研究新趋势的关注和参与，而且表明他们自身的知识素养和研究工作能力正在迅速提高。研究和考释魏晋南北朝的史籍和史文，是文献功底深厚的中年学者所感兴趣的工作，文集的有关文章，即是他们新取得成绩的汇报。总之，无论从作者的代表性，还是从论文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来衡量，这部论文集较之于此前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所编选的几部论文集而言，都有所发展和提高。我相信，它的问世，将对中外魏晋南北朝史学界的研究工作，包括交流成果、切磋得失、协调方向、密切合作等诸方

面，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襄樊乃襄阳、樊城之合称，而襄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中部的重镇，不少前贤往哲曾在此居留。孔明蓄志待时，刘备求贤兴业。岷岭逶迤，堕泪立羊祜之庙；万山苍翠，纪功沉杜预之碑。回思古昔，感慨万千；展望未来，心潮澎湃。我们这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应当做出无愧于古人的成就，从而使 21 世纪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入一个云蒸霞蔚的绚丽时期！

朱大渭

1996 年 3 月 20 日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朱大渭 (1)
谈谈刘弘	韩国磐 (1)
魏晋时期的中央政界与地方社会	
——围绕西晋刘弘墓的发掘问题	
.....	(日本) 葭森健介 (10)
“侨旧体制”的展开与东晋南朝史	
——为整体理解南北朝史的一个提议	
.....	(韩国) 朴汉济 (21)
汉魏之际的几支特殊世兵 —— 青州兵、徐州兵	
与东州兵	高 敏 (40)
曹魏都督诸州军事制度试探	张鹤泉 (55)
姜维入蜀与诸葛亮的攻守策略	施光明 (71)
论三国时期联合战线的历史教训	张大可 (82)
从荆州之争看三国时期的外交斗争	余鹏飞 (97)
试论孙吴人才群体的特征及效应	卢华语 (111)
董卓、曹操与汉魏皇权	陈 勇 (124)
刘备遗嘱“君可自取”句辨释	方北辰 (133)
从出土文物看三国东吴的经济发展	罗宗真 (138)
南朝勋品制度试释	张旭华 (145)
梁武帝天监年间官制改革思想及官僚体制上之新	
趋向	(韩国) 金裕哲 (160)
释“荆州本畏襄阳人”	何德章 (191)
魏晋南朝时期的何氏家族	孟 聚 (200)

北魏孝武帝西入长安史实考释·····	赵文润 (215)
魏氏高昌田赋制度再探·····	杨际平 (230)
袁宏玄学化史论初探·····	周国林 (244)
试释《咏怀》诗中的“王子”“夸父” 和“夏后”·····	景蜀慧 (258)
论十六国时期的“变夷从夏”及其历史意义·····	童超 (265)
魏晋时期河西民族融合中的羌化趋势·····	赵向群 (279)
磁县湾漳北朝大墓墓主试析·····	江达煌 (289)
陕西北周墓葬与民族问题·····	周伟洲 (302)
“五胡”时代的“霸史” 及其佚文搜集工作·····	(日本) 关尾史郎 (313)
晋代及南朝史料中的黄鹤楼·····	舒邦新 (324)
后记·····	(331)

谈谈刘弘

韩国磐

西晋末年担任荆州刺史刘弘，该是个关键性人物，《晋书》卷66有《刘弘传》（以下简称刘弘本传），兹即据之来谈谈这个历史人物。

刘弘祖父刘馥，曹魏时官至扬州刺史，曾经修治芍陂、茄陂、七门、吴塘诸陂，广溉农田。父亲刘靖，曹魏时历任河南尹、大司农、卫尉，官至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广陆亭侯，在幽州曾修治戾陵渠大陂，以溉稻田，并整顿边防。《三国志》有刘馥、刘靖父子传。

刘弘少年时家在洛阳，据刘弘本传所载，弘与“（晋）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三国志·刘馥传》注引《晋阳秋》，亦言“弘与晋世祖（即武帝司马炎）同年，居同里”。刘弘本传虽未载明弘出生年月和歿时岁数，而已知其与司马炎同年，即可由此推知之。《晋书·武帝纪》载司马炎卒于太熙元年（290年），时年五十五，则其生年当在曹魏青龙四年（236年），这也就是刘弘的出生之年了。再据刘弘本传，弘卒于永兴三年（光熙元年，306年）。自青龙四年至永兴三年（236—306年），则刘弘卒时虚岁七十一岁。

刘弘出身于这样的官僚贵族之家，且与晋武帝同年、同里而且同学，故其仕途一帆风顺，据其本传所载：

“（弘）……以旧恩起家为太子门大夫，累迁率更令，转太宰长史，张华甚重之。由是为宁朔将军、假节监幽州诸军事、领乌丸校尉，……封宣城公。”

《三国志·刘馥传》注引《晋阳秋》，则谓弘“以旧恩屡登显位”一句带过，没有载其所历官职。按太子门大夫，《晋书·职官志》未载此官。《宋书·百官志》载太子属官有“门大夫二人，汉东京置，职如中郎将，分掌远近表笺，秩六百石。”又载其官品为第六。《南齐书·百官志》也载有太子门大夫，但未载其职掌品位。考之于《通典》卷30《职官》东宫官属官门郎下说：

“秦有太子门大夫，汉因之，员二人（《汉官仪》曰：门大夫选四府掾属），职比郎将（《汉官仪》曰：安帝时太子谒庙，门大夫乘从，冠两梁冠），魏因之。晋太子门大夫准公车令，掌通笺表及宫门禁防，宋因之。”

孙星衍辑《汉旧仪》亦载：“门大夫比郎将。”如《通典》所载，太子门大夫为秦官，汉沿秦置，非如《宋书·百官志》之言为东汉所置。刘弘起家官即为六品的太子门大夫，自然与其出身于官僚贵族家庭密切相关。

接着，几经升迁，刘弘任职率更令。《晋书·职官志》载：“率更令，主宫殿门户及赏罚事，职如光禄勋、卫尉。”《通典》卷30《职官》谓率更令原亦秦官，晋时职掌同于《晋书·职官志》所载。案《宋书·百官志》，率更令、家令和太子仆，为太子三卿，秩千石，五品。以后，刘弘又迁为太宰长史，晋以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为八公，诸公置长史，故有太宰长史，秩千石。

随后，刘弘迁为宁朔将军、假节监幽州诸军事、乌丸校尉。《通典》卷29《武官》杂号将军中有宁朔将军，注言“魏以王浑为之”。《宋书·百官志》载宁朔将军为四品。《文献通考》卷59《职官》杂号将军中亦有宁朔将军，注亦言“魏以王浑为之”，当即依据《通典》。而《资治通鉴》卷85太安二年（303年）：“宁朔将军沛国刘弘为荆州刺史”句下胡注说：“宁朔将军始见于此”，可能有误。不过，《晋书·王浑传》记其在魏时官职，未见有宁朔将军。宁朔将军只是刘弘在幽州时的将军名号，其职务是“假

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宋书·百官志》“刺史领兵者”为第四品。而《晋书·职官志》说：“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刘弘在幽州不仅有将军号，且假节监诸军，品位已高。本传又言其在幽州时“甚有威惠，寇盗屏迹，为幽朔所称，以勋德兼茂，封宣城公”，则已取得公的爵位。

特别是《水经注》中，有足补刘弘在幽州的事迹者，该书卷14《鲍丘水》条引《造戾陵遏记》（此题名为《全晋文》卷14所加，遏同竭）说：

“晋元康四年（294年），君（指刘靖）少子骁骑将军平乡侯弘，受命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宁朔将军……”

这里记刘弘是“使持节监诸军事”，与刘弘本传有异。案《宋书·百官志》，诸持节都督官品第二。尤其是《水经注》的引文写明刘弘担任监幽州诸军事的年代，在元康四年；又载明刘弘在出任幽州官职前是骁骑将军、平乡侯。案《宋书·百官志》，乡侯为第四品。骁骑将军与领军将军、护军将军、左卫将军、右卫将军及游击将军，号为六军。就在上段引文下，还记载着刘弘重修戾陵遏的事：

“（元康）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遏）毁损四分之三，……（弘）亲临山川，指授规略，命司马关内侯逢挥、内外将士二千人，起长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门，门广四丈，立水五尺，兴复载利通塞之宜，准遵旧制，凡用功四万有余焉。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襁负而事者，盖数千人。《诗》载经始勿亟，《易》称民忘其劳，斯之谓乎！于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国思郑渠之绩，魏人置豹祀之义，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纪勋烈……”

则修复戾陵遏，即是刘弘在幽州的一大政绩；又刘弘在出任幽州

职务前，曾任征南大将军使持节都督荆州诸军事羊祜的参军，以及骁骑将军，封平乡侯等；这些皆可补《晋书》刘弘本传之缺。《晋书》刘弘本传记载刘弘任职幽州及此前之事均甚简略，故于上述稍稍补充说明之。

由于刘弘出身官僚贵族之家，为官颇有政绩，在幽州时更是“勋德兼茂”，所以在张昌起义时，才调他为使持节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从太安二年（303年）到永兴三年（306年），刘弘在荆州前后不过四个年头，而二千一百四十余字的《晋书》刘弘本传，却有二千余字记其在荆州事迹，记其在幽州及更前事迹却不到一百二十字。可见史官为刘弘作传，就是要记他在荆州的事迹的。

据《资治通鉴》卷85所载时间，太安二年（303年）五月，刘弘始到荆州。由于“义阳蛮张昌聚党数千人”，特调刘弘前来镇压。刘弘本传说：

“太安中，张昌作乱，转使持节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率前将军赵骧等讨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

于是刘弘与前将军赵骧、平南将军羊伊，进屯宛城。由于使持节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新野王司马歆，为张昌所败，死于樊城，晋朝即以刘弘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同年六月，刘弘用南蛮长史陶侃为大都护、参军蒯恒为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进据襄阳。张昌并军围攻宛城，赵骧战败，羊伊战死，刘弘退屯于梁（河南汝南）。张昌趁胜进攻襄阳，为陶侃等所战败而退。同年七月，据《资治通鉴》卷85所载，张昌部下石冰，进攻扬州，又破江州；昌别将陈贞攻占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长沙诸郡；于是荆、江、徐、扬、豫五州之地，多被张昌所据。刘弘赶快派陶侃等进攻张昌于竟陵，豫州刺史刘乔也派李扬与陶侃并力，大败张昌，其众皆降，张昌逃至下隳山，次年被俘处死，张昌起义失败。

当刘弘退屯于梁时，晋征南将军范阳王虓，派前长水校尉张奕领荆州，弘至，奕不受代，且举兵相拒，于是刘弘击杀张

奕，并上表说明原委。经过朝廷同意，实际上晋朝皇室在八王之乱中，无能为力，仍命刘弘镇守荆州。

刘弘至荆州的首要事件就是镇压张昌所领导的流民起义，这是无足称道，而应予以批判的。不过，在镇压起义后，他的许多措施，稳定了荆州地区的形势，对于恢复生产，整顿吏治，严肃风纪，选拔人才，很有积极作用。兹略予说明之。

(一) 劝课农桑、恢复生产。在战乱时，生产多少会受到破坏，事定之后，必须立即予以恢复。刘弘本传这样说：“弘于是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岁用有年，百姓爱悦。”可见在劝农省赋方面取得了成就。刘弘本传还记载着两件关于生产的事例：

“旧制，岷、方二山、泽中，不听百姓捕鱼。弘下教曰：礼，名山大泽不封，与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无复厝手地，当何谓邪！速改此法。”

我们习知东晋南朝时的占山封水，读此，则知西晋荆州即有此事。刘弘下令革除此弊，使百姓樵捕有地。再则当时荆州有流民十余万户，羈旅贫乏，刘弘“乃给其田种粮食”，使之务农，且“擢其贤才”，这既安定了流民，也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

(二) 反对空谈、注重实际工作。《太平御览》卷 253《职官部》说：

“晋刘弘教曰：太康以来，天下无虞，遂共尚无为，贵谈庄老，少有说事，外托论公务，内但共谈笑。今即同舟而载，安可不人人致力耶！”

这是刘弘给郡参军的教令，言明自太康以来共尚空谈，今处危难之际，如共在一舟中，再不人人努力，必至船翻人亡。故刘弘在荆有所举措，都很周密地指示部下守相，如刘弘本传中所说：

“弘每有兴废，手书守相，丁宁款密，所以人皆感悦，争赴之。咸曰：得刘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

足见他不说空话，而是给予具体详尽的措施细则，所以大家争先恐后地予以实行。这样的细则，比派十个州从事来还要好。

(三) 反对纵横捭阖，在八王之乱中比较中立，主张和解。刘弘本传说到他在荆州取得政绩，“威行南服”后，前广汉太守辛冉以纵横之事说弘，弘大怒，杀掉辛冉。众所周知，战国时纵横之士游说诸侯争夺政权，辛冉当即游说刘弘趁司马氏骨肉相残时，于乱中取权，故为刘弘所杀。《资治通鉴》卷86亦载此事，胡三省作注说：“史言刘弘忠纯”。即指明刘弘忠于晋朝，反对纵横捭阖，乱中夺权。另有一事，即当时太乐伶人多避乱荆州，有人劝刘弘集中伶人制乐，而弘不允，要等晋室安定时，送还乐人于太乐署。此亦可见刘弘的苦心。

特别是刘弘对八王之乱的态度，颇为中立。永兴二年（305年），他不杀河间王颙所派的顺阳太守，且与之共讨陈敏，即是一例。更明显的是东海王越用范阳王虓代刘乔为豫州刺史，刘乔依靠河间王颙，不受代，击走司马虓，于是东海王越拟出兵讨伐刘乔。这时，刘弘写信与刘乔和司马越，劝他们解怨释兵，共奖王室，而乔、越皆不从。于是，刘弘又上表与晋惠帝，《晋书》卷61《刘乔传》说：

“（弘）又上表曰：范阳王虓欲代豫州刺史乔，乔举兵逐虓。司空、东海王越以乔不从命讨之。……自顷兵戈纷乱，猜祸锋生，恐疑隙构于群王，灾难延于宗子，权柄隆于朝廷，逆顺效于成败。今夕为忠，明旦为逆，翩其反而，互为戎首，载籍以来，骨肉之祸未有如今者也。……臣以为宜速发明诏，诏越等令两释猜嫌……”

表中痛陈皇室骨肉相残之害，实即写给河间王颙看的。因河间王颙将惠帝劫持在长安，以对抗东海王越等。表中刘弘同样陈述了要求双方和解之意，颙亦拒之。刘弘调解虽未成功，但其中立态度明显可见。固然刘弘本传说到，后来弘见河间王颙大将张方的残暴，知必失败，因遣使愿受东海王越节度。而《三国志·刘馥传》注引《晋诸公赞》说：“弘有刘景升保有江汉之志，不附太傅司马越，越甚衔之，会弘病卒。”《册府元龟》卷446亦

有同样的记载。则刘弘是否归心于东海王越，还有问题。而其保持中立，希望和解，目的就是“共奖王室”，与他的反对纵横捭阖，忠于晋朝，是相一致的。

(四) 体恤下情、爱抚士卒。刘弘本传记载有这样一件事：

“弘尝夜起，闻城上持更者叹声甚苦，遂呼省之。兵年过六十，羸疾无襦。弘愍之，乃谪罚主者，遂给韦袍复帽，转以相付。”

《太平御览》卷 743《疾病部》也载此事，但“叹声甚苦”作“咳声甚深”。可是，《册府元龟》卷 398《将帅部抚士卒》与卷 412《将帅部仁爱》均作“闻城上持更者叹声甚苦”，与刘弘本传同；下文也都说此老兵年六十，“羸疾无襦”，显然所载为同一事，说明老兵为“羸疾”病人，既明言有病，则咳声、叹声皆无不当，病人皆可发出这类声音。而刘弘夜闻此声，即呼老兵询问实情，给予韦袍复帽，足见刘弘的爱抚士卒。《太平御览》卷 426《人事部》又载：

“刘弘教曰：录事巫卫，忠清厉节，衣食不充，赐单复衣各一具，恒令厨食。给其家谷三百斛。诸吏宜见贤思齐。”此刘弘恤下用贤的又一例，且鼓励部下向贤者看齐。

(五) 选用人才、以诚信相待。刘弘在荆州选拔人才，如他的本传所言，“随才补授，甚为论者所称”。兹举其突出者数例：

一为其部将皮初，卓有勋，推荐之为襄阳太守。而晋朝朝廷以皮初名位不高，要改用刘弘女婿、曾任东平太守的夏侯陟。刘弘坚决反对，其本传载此事说：

“弘下教曰：夫统天下者，宜与天下一心；化一国者，宜与一国为任。若必姻亲然后可用，则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哉！乃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皮初之勋，宜见酬报。诏听之。”

由于刘弘的坚持，不用自己女婿而仍用有功勋的皮初为襄阳太守。

二为刘弘以镇压张昌之功，“应封次子一人县侯。弘上疏固让，许之。”这是坚决推辞掉儿子的封侯。

三为重用陶侃，以诚信待人。当刘弘受命到荆州时，陶侃正由县令退职下来，仕途不如意。而刘弘看中陶侃是个人才，就起用他为南蛮长史。打败张昌，进驻襄阳时，《晋书》卷66《陶侃传》记刘弘对陶侃说：

“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

《世说新语·言语篇》刘孝标注亦载此事。刘弘告知陶侃，弘为羊祜参军时，羊祜说他日后会坐上羊祜的座位。羊祜当时是征南大将军使持节都督荆州诸军事。刘弘这时也说陶侃将来会继任他的职位。如非深信陶侃，不会这样说的。以后，陈敏反晋，欲进犯荆州时，刘弘用陶侃为江夏太守，加号鹰扬将军，以抗拒陈敏。而陶侃与陈敏是同郡人，又同年举吏，有人因此而说陶侃不可靠，刘弘本传（《陶侃传》、《册府元龟》卷422《将帅部》等略同）说：

“侃与敏同郡，又同岁举吏，或有间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为前锋督护，委以讨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为质。弘遣之曰：贤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归也。匹夫之交尚不负心，何况大丈夫乎！陈敏竟不敢窥境。”

刘弘既重陶侃人才而用之，又以诚信相待，故能皆成其功。

如上所言，刘弘的用人，就是举贤任能。如非贤能，自己的儿子、女婿也不能封爵任职；如为贤能之人，虽在下位亦可超迁。而用贤能之人，又能信之不疑，尤为难能可贵。在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僚，能够如此选用人才，足见我国有“任人唯贤”的传统，堪为借鉴。刘弘所用的陶侃、应詹等人，在晋室南渡后还继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陶侃曾一再担任使持节都督荆州诸军事，在平定苏峻之乱后，官至太尉、都督荆江等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应詹佐东晋，助平王敦之乱，官至平南